

美部會在華第一間印刷所

——布魯恩印刷所考論

譚樹林

[提要] 布魯恩印刷所是美部會在廣州創辦、當時中國境內最大的使用金屬活字印刷的出版機構，開美國基督教會在華印刷出版之嚆矢。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布魯恩印刷所的研究，停留在偶爾提及或一筆帶過之狀態，迄今尚無專論。本文爬梳相關史料，對布魯恩印刷所的創建緣起、沿革、印刷活字及工匠等進行詳細考證，並以重要出版品為例，論述其對中外關係、中西文化交流及西方漢學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 布魯恩印刷所 裨治文 衛三畏 美國漢學

[中圖分類號] K837.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3 - 0173 - 12

一、布魯恩印刷所創建之緣起

1832年5月，美國海外傳教部總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下簡稱美部會）來華傳教士在廣州創建一間印刷出版機構，稱美部會印刷所（A. B. C. F. M. Press），也有學者將其稱為美國海外傳道會會長理事會書館。^①因其最初為出版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而建，因此亦稱《中國叢報》印刷所。^②但從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一書的中文頁標注來看，“香山書院”很可能是這間印刷所的中文名字。因為該書中文頁標注為“咪喇啞衛三畏鑒定”、“道光辛丑年鑄”（1842年）、“香山書院梓行”；英文頁上的出版地及出版機構則標為“Maca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Press”。所以稱其為“布魯恩印刷所（the Bruen Press）”，實為紀念美國長老會牧師馬蒂亞斯·布魯恩（Matthias Bruen）而以其名字命名。但目前國內學者提及這間印刷所時，就筆者目力所及，均稱其為“布魯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實乃將“Bruen”誤寫成“Bruin”所致，其中文名宜音譯為“布魯恩印刷所”。它是美部會在華創建的第一間出版印刷機構，後發展為當時中國境內最大的使用金屬活字印刷的出版機構。美部會之所以要在廣州建立這樣一間出版機構，實與

基督教會在華傳教傳統尤其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影響有著密切關聯。

自印刷術傳入歐洲後，印刷出版就極受基督教會青睞。來華傳教士歷來重視印刷出版對傳教的重要性。晚明時期首位獲准在華居留的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就指出印刷出版“這種啞式宣教法的重要”，在他看來，“書籍是最能言的，又是最有效的，它能責備中國人生活的無系統，而不致傷及他們的雅意；它能光照他們的心地，而不致和他們的理智發生衝突；可以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認識真理。”被譽為中國天主教史奠基人的利瑪竇（Matteo Ricci）也認為，“在中國有許多處傳教士不能去的地方，書籍卻能走進去，並且仗賴簡捷有力的筆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裡行間，透入讀者的心內，較比用語言傳達更為有效。”^⑨尤其“在該帝國中，文化如此昌盛，以至於在他們之中只有很少的人不會讀某種書。他們的所有教派都更應該是以書籍的手段，而不是以在民間的佈教和演講的方法來傳播與發展的。這種做法曾為我們的人向基督徒傳授必要的日課經提供了很大幫助。因為他們或自己閱讀或讓其親屬朋友為其閱讀刊本基督教理書時，立即就能牢記心田，而且那裡從來不缺乏能閱讀書籍的人。”^⑩十九世紀初，基督教新教決定在華開拓傳教事業時，亦頗為重視印刷出版。最先決定在中國開展傳教事業的英國倫敦傳教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其派遣第一位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前，就已經多方打聽中文印刷的情形。^⑪1807年9月馬禮遜抵華後，不久即認識到“書籍的果效不聲不響，卻強而有力（silent but powerful）”^⑫。1813年，作為馬禮遜的助手被派往中國的米憐（William Milne）亦認為：“每一種文明的語言中，印刷在傳播人類或神聖知識方面具有十分顯而易見的優勢。在漢語中，書籍作為一種提高改進自身的工具，也許比任何其他現有的傳播工具都更為重要。閱讀漢語書籍的人數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⑬正是這種識見，使馬禮遜在華傳教時積極從事印刷出版，創下了中國印刷出版史上的多個“第一”：翻譯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聖經》全譯本；編纂出版第一部華英、英漢字典《華英字典》；協助創辦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尤其是《華英字典》“既可以當一部字典，又可以當作一部百科全書來使用，它包括了有關中國的傳記資料、歷史和民族風情、禮儀和國家制度的評介，是一部彙集了有關中國人的生活和歷史文獻的最豐富的資料的工具書”^⑭，“奠定了馬禮遜作為十九世紀第一位漢學家的地位”^⑮。在其影響下，來華的倫敦傳教會教士像米憐、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等均在印刷出版方面卓有建樹。而美國來華傳教士在廣州建立印刷所從事印刷出版，亦是馬禮遜呼籲的結果。

馬禮遜雖為英國傳教士，卻與美國基督教會聯繫密切，這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其取道美國來華的經歷。馬禮遜本打算乘坐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赴華，但遭到公司董事會拒絕，因為他們認為“使用我們的船隊載送傳教士駛往我國在東方的殖民地是最愚蠢的、最過分的、代價最高的和不可原諒的方案”^⑯。無奈之下，馬禮遜只好取道美國，最後乘坐美國商船抵達中國。但假道美國來華，卻給馬禮遜日後在華傳教事業帶來一些始料未及的益處。朱佑人牧師即認為：

（一）使他獲得美國國務卿的專函介紹給廣州的美國領事；（二）使他由美國免費坐船到廣州；（三）使他到廣州後得到洋行大班（也是美國的廣州領事）招待到家中住宿，日後且一再的支持和資助他的工作；（四）使他給人以為是美國人而廉價租得法國洋行的房子居住（當時英法正處於交戰狀態，英國人不能租得法國人的地方）；（五）又因在美國時和一些宣教團體打了交道，以致日後能得到美國教會的支持，以及派遣宣教師到華參與工作……^⑰

確然如此。馬禮遜取道美國赴華傳教，使美國基督教界開始認識到開拓對華傳教的重要性，

儘管“美國的基督教界早已意識到傳教的重要性，從未忽略中國以及東方的千百萬人，期待著那裡能像其他地方一樣，‘來幫助耶和華攻擊勇士’”，但在馬禮遜取道美國來華之前，美國基督教會並未付諸行動。正是藉馬禮遜取道美國，與美國基督教界人士的廣泛接觸，才真正引起美國基督教會對華傳教事業的重視，並在馬禮遜的呼籲下，最終開拓了在華傳教事業。對此，馬禮遜遺孀艾莉莎·馬禮遜（Eilza Morrison）指出：“他此時和美國牧師以及基督徒的接觸，讓他極為振奮，而且可以被視為聯繫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的紐帶，這些事情讓美國的基督教界加入了中國的福音化進程。”^⑩

馬禮遜來華後，一直與美國基督教會保持密切聯繫。囿於對中國的瞭解，美國基督教會雖然向亞洲的孟買（1817年）、歐洲的馬耳他（1822年）等地派遣了傳教士，並建立印刷出版機構，^⑪但卻沒有向中國派遣傳教士，更遑論計劃在華開辦印刷出版機構，這從馬禮遜與美部會的通信可以看出。1827年11月，馬禮遜致信美部會，呼籲該會要重視在中國開展印刷事業。美部會司庫埃瓦茨（Jeremiah Evarts）在覆信中稱：“在你來信提到的計劃中，有一項工作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就是應在廣州設立一間英文印刷所。我認為，經過審慎的安排，成立印刷所可能是極為有用的。”^⑫1830年10月，埃瓦茨再次致信馬禮遜：“我們非常感謝在有關東方的海外傳教事業上你給我們的任何建議，特別是關於我們在何時可以運送一部印刷機去協助在中國的聖工。”^⑬美部會首位派往中國的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抵華後不久亦認識到：“由於中國政府不容許公開講道傳播福音，因此，傳播基督教相關知識的最好辦法就是刊印宗教書籍和手冊。如此看來，新教傳教士到中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刊印和散發書籍。”為此，裨治文在給美部會的報告中強調建立一家教會印刷所的重要性：通過“印刷一些宗教書冊，將基督教的精神要旨傳達給中國人，這樣也能逃避中國政府對外國人活動的限制”^⑭。未及美部會回覆，馬禮遜和裨治文建立印刷所的請求就得到廣州美商同孚行老闆奧立芬（D.W.C.Olyphant）的響應。奧立芬雖為商人，但對新教在華傳教事業熱情贊助：1807年馬禮遜來華即是奧立芬提供免費艙位，1830年美部會派裨治文來華亦得到奧立芬資助。他並向美部會承諾：凡願意到中國從事傳教事業的美國傳教士，他都提供免費艙位以及在廣州第一年的食宿等費用。^⑮25年間，奧立芬給予來華傳教士免費乘坐他的商船達51人次，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盡力提供幫助。裨治文夫人稱奧立芬為“美國對華傳教之父”^⑯是當之無愧的。對裨治文和馬禮遜提出建立印刷所的請求，奧立芬不僅安排他所屬的紐約布利克街（the Bleeker-Street）長老會教堂將一台印刷機和英文鉛字捐贈給在華的美國傳教士，而且還表示“願意承擔出版方面的虧損”，並免費提供商館的一個房間作為印刷場所。1831年12月，印刷機運抵廣州，但英文鉛字遲至翌年4月才由“羅馬號”（Roman）運到。這樣，印刷出版所需的各種設施已經齊備，裨治文即在奧立芬提供的房間設立印刷所，此即“布魯恩印刷所”。它是美部會在中國建立的第一間印刷所，開美國基督教會在華印刷出版之嚆矢。

二、布魯恩印刷所之沿革

1832年5月，布魯恩印刷所在廣州美國商館後排的一個房間創建，最早的出版物就是利用英文鉛字排印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1833年10月26日，美部會派遣的熟練印刷工衛三畏抵達廣州。^⑰因為他是作為專職的印刷工身份來華的，不久即接替裨治文，執掌布魯恩印刷所。由於當時清政府嚴禁印刷出版基督教書刊，為逃避清政府的查禁，1835年12月，美部會決定將布魯恩印刷所遷往澳門。^⑱實際上，在五口通商前，廣州官方不允許外國人長年在此逗留，每年4月

到8月的所謂非貿易季節，從事貿易和其他活動的外國人必須離開，大多數人選擇暫時遷居澳門。抵華後的衛三畏出於工作方便，除印刷《中國叢報》需短期在廣州外，其大半時間是在澳門度過的。印刷所遷往澳門，對從事印刷出版事務的衛三畏而言，倒是方便之舉。很可能由於此時衛三畏已全盤負責印刷所事務，所以這間印刷所又逕稱“衛三畏印刷所”^④。實際上，遷往澳門的印刷所就設立在衛三畏住所客廳的下面。在1836年8月26日寫於澳門的信中，衛三畏這樣描述：

我的住處是一個兩層樓，樓上有12個房間，每間周長20英尺。因為房子建在山坡上，所以它有一邊是三層，也就外加了兩個房間。兩棵樹（一棵無花果，一棵接骨木）構成了我的花園，廚房在對面並且和我住的小樓有一段距離。房子底層住著一個搬運工、一個管家、一個苦力、一個廚師、一個印刷工和四個小男孩，總共九個人。印刷所在客廳下面，是一個明亮的房間——當太陽照進來的時候。此外在房子的一邊還有一個遊廊，大約60英尺長，它為我們納涼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這樣的天氣中確實是非常需要的。^⑤

從衛三畏的描述可見，其住處寬敞舒適，這裡成為廣州貿易季節結束後美部會傳教士在澳門活動的據點，也就不難理解。

布魯恩印刷所在澳門一直持續到1844年。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其作為華人傳教新基地的環境與條件吸引了英美新教會。洛維特（Richard Lovett, M. A.）在談到香港的特殊優勢時寫道：

香港與在教會推動下展開傳教活動的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香港具有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優勢，居民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歐化氣氛。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的生活比其他地方更為自由，由於受歐洲人的影響，他們的思想也更為開放。加上在英國的統治下，生命與職業的安全得到保障，……然而，香港佈道會存在的重大意義，並不局限於其活動的區域，或活動對象人數的多寡。香港恐怕是西洋社會在東方最重要的中心地。^⑥

實際上，美部會傳教士好像具有未卜先知之能力。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前的1842年7月，裨治文就已前往香港，覓地“開始修建一個傳教會所”。裨治文之所以有此舉動，很可能是布魯恩印刷所遷往澳門後，雖然避開了清政府的阻撓，但澳門畢竟是葡萄牙租借地，受澳葡政府支持的天主教會極不願意新教在澳門發展壯大。在此種情勢下，與澳門毗鄰的香港，如能成為英國殖民地，無疑是新教建立對華傳教站的首選之地。經過兩年的籌建後，美部會在香港的新傳教站建成，1844年10月19日，布魯恩印刷所遷往香港新址。^⑦旋即（1844年11月），在離家11年後，衛三畏從香港乘郵船回國，布魯恩印刷所重新由裨治文負責。

然而，布魯恩印刷所在香港持續時間不長。因為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實際上並不太利於美部會開展傳教活動。特別是1845年清廷允准傳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後，香港無論從開放環境還是人口方面，都無法與大陸的口岸相比。裨治文在致美部會諮詢委員會（the Prudential Committee）秘書魯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的信中提到將離開香港返回廣州的決定：

您清楚我們當初搬到這裡來的情況。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我們可能一部分人或者全部都從這裡搬回廣州去。波乃伊先生和我都對在這個殖民地繼續待下去的意義表示懷疑。儘管我們已經找到並會繼續找到一些我們可以佈道、散發經文和《聖經》的對象，但我們的責任是到對傳教站更有好處和前景的地方去。^⑧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之影響。但無論實情如何，1845年7月，美部會將傳教站由香港遷往廣州，布魯恩印刷所也隨遷廣州原址。1848年9月，衛三畏返回中國後，重新執掌印刷所。但是，

這時他發現自己日益與美部會諮詢委員會的觀點相左：諮詢委員會認為應當關閉印刷所，因為印刷所主要被用於出版像《中國叢報》及哲學著作之類的世俗書刊。不僅印刷機構，甚至學校、醫院也應停辦。對此，衛三畏在 1852 年 6 月致信 W. F. 威廉斯牧師：“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度裡，一些輔助性的方式，比如說開辦宣講和奉行基督教教義的學校、醫院等，對於傳教事業是相當重要的。伯駕博士的醫院還在辦，主要依靠外國人募捐的基金來維持。他的醫院裡宣講基督福音，還有幾家醫院也是如此。我並不否認這些學校、醫院等機構佔用了我們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我想，如果失去了這個印刷所，我會深感遺憾，雖然現在這樣說也許為時過早。”^②

衛三畏的辯解未能改變諮詢委員會的想法，美部會決定將印刷所賣掉。1856 年秋，衛三畏編寫的《中國商務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第四版印刷出版，該書為印刷所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所有傳教士被驅逐出境，廣州處於一片混亂之中。12 月 14 日，一場大火將廣州所有外國商館燒毀，設在商館中的布魯恩印刷所化為灰燼，這批活字完全焚毀無存。^③據衛三畏估算，美部會在這場大火中的損失，包括全部活字及其他材料的價值共計 20,000 美元，他本人也“由於書信和各種設施被毀所造成的損失共計達到 1,550 美元（包括利息）”^④。本來衛三畏最有可能買下印刷所，^⑤現在印刷所被毀，似乎成為他在事業上作出改變的一個契機。^⑥衛三畏不久即向美部會提交了辭呈，脫離美部會，接任美國駐華使館秘書，從此轉向對華外交事務。1868 年，美部會以所得清政府的賠償費在北京重建新館開業，但已不能再稱為布魯恩印刷所，它實際上在 1856 年的火災後已經完全消失了。北京重建的新館，在 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被民眾燒毀。

三、布魯恩印刷所之印刷活字及工匠

布魯恩印刷所初建時，僅有一台手動印刷機（a hand press）和一套英文鉛活字。1835 年，為印刷麥都思編纂的《福建土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衛三畏從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那裡借來英式印刷機（Albion Press）與英文活字。據衛三畏書信提供的資料，1839 年時布魯恩印刷所已擁有大、小兩套英文鉛字：大號鉛字有 60 盒，“大小相當於四個 12 點活字，共 25000 多個，幾乎沒有兩個是相同的”；小號英文鉛字有 20 盒，“一盒一盒地放在架子上，……其中的間隔用 18 點鉛字填充。所有的鉛字都是背面朝下、正面朝上的”^⑦。此時印刷所擁有的英文鉛字已達 80 盒，當時在華印刷所中，這樣的規模堪稱是獨一無二的。

布魯恩印刷所初建時沒有中文活字，需要印刷中文作品時，就只能請中國刻工幫忙進行雕版印刷。1834 年，美國教會將中國木刻漢字送到波士頓，用澆鉛版法制成活字，再輸入中國，用於印刷中文教會書刊。從此，中文木刻字模改為鉛模。^⑧據美國學者科克利（J. F. Coakley）研究，1835 年 12 月，美部會決定將印刷所遷往澳門時，僅將印刷所的英文印刷機與英文活字遷往澳門，而採用木刻版印刷的“中文印刷所”（Chinese Press）則遷往新加坡。科克利因印刷方式而將布魯恩印刷所稱為“英華印刷所”（Anglo-Chinese Press）。^⑨然而事實是，遷往澳門後的布魯恩印刷所仍然擁有中文鉛活字。在 1839 年 1 月寫於澳門的一封信中，衛三畏明確提到：“首先我們這裡有中文鉛字，它們被安放在屋子四周的架子上，正面朝上，因為只有將鉛字一個個看過去才能找到其中需要的那一個”，甚至“中文鉛字佔了半個房間的面積”^⑩。

那麼，此時布魯恩印刷所的中文鉛活字從何而來呢？實際上，這批中文鉛活字是原屬於英

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in Macao）的那批中文鉛活字。1814年9月，為印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公司董事會僱用印工湯姆司（Peter Perring Thoms）攜帶一台印刷機和一副英文活字等到澳門，成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印刷出版《華英字典》。因印刷《華英字典》需採用中英文夾排，湯姆司在經過最初一段嘗試後，發現中英文都以金屬活字印刷的效果比雕版和活字並用要好得多。經馬禮遜提議，先由湯姆司用含錫的合金製成鑄模柱體，再由中國工人在柱體上逐一雕刻漢字。這樣，湯姆司和幾個中國工人合作製成一批中文鉛活字。除《華英字典》外，在20年的出版歷程中，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共出版和代印了20餘種圖書、雜誌和報紙，它們“對於增進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知識與態度，不論是瞭解、同情、歧視或野心，都產生相當的作用”^⑮。

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失去對華貿易專利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認為沒有必要再繼續印刷所的存在，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最終被迫關閉，其擁有的中文鉛活字亦閒置起來。然而印刷所承印的麥都思的《福建土話詞典》此時尚未完成全書的一半。為了完成詞典的出版，麥都思向在廣州、澳門的外商募得資金後，敦請衛三畏代為印刷詞典的剩餘部分。鑒於布魯恩印刷所已有的中文字模不敷應用，衛三畏乃借用了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已經閒置的全部中文字模，至1837年中最終完成《福建土話字典》的印刷出版。^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被取消後，英國當局曾派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任駐華貿易商務監督，但未幾即發生“律勞卑事件”而病逝於澳門。1841年4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又譯砵甸查、砵甸乍、波廷傑）被任命為英國駐華全權代表，負責處理英國東印度公司遺留事務，就是他將東印度公司印刷所的中文活字全部贈予衛三畏：“1842年，亨利·波廷格爵士代表英國當局將這些活字正式贈予了我。”^⑰“亨利·波廷格”即璞鼎查。當然，璞鼎查的贈予是有條件的，即布魯恩印刷所要承印英國官方文件。^⑱關於這套中文鉛活字的詳細情況，雖然馬禮遜、湯姆司等當事人沒有留下確切記載，但從衛三畏的記述中可窺見一斑：

這套活字是應東印度公司的要求於1814年開始製作的。從1835年開始由我掌管使用。當時共有兩套，一套字體較大，裝在60個字盤中；另一套字體較小，裝在16個字盤中。此外，還有幾百個手寫體和草字的鉛字。所有這些鉛字都是由工匠們用鉛塊或錫塊手工製作而成的。他們先把字寫在金屬塊光滑的一端，然後用鑿子雕鑿出來。

字體較大的一套每個活字1英寸見方，在製成時包括了所有的漢字，共計約46000個，其中一些是重複的，但是在長期的使用中遺失了很多。

字體較小的一套使用率很高，共有22000個不同的漢字。由於一些常用字有好幾個備用活字，所以這套活字的總數達到了七萬多個。在我使用的21年中，我不斷地對這兩套活字進行增補，字體較小的一套的增補量尤其多。到最後，這兩套活字的總數都比最初有所增加。^⑲

這批中文鉛活字究竟多少，已無法確知。但就金屬活字的數量而言，說布魯恩印刷所是當時中國擁有金屬活字最多的印刷所，應非臆斷。

布魯恩印刷所設立之初，裨治文兼《中國叢報》編輯、印刷及發行事務於一身，雖然他聘請了一位印刷工，但這位印刷工“是個葡萄牙人，不太懂英語，這樣使得工作更是困難”，實際上對裨治文幫助不大。除《中國叢報》外，裨治文還要忙於“學習、教書、寫作”等其他工作，頗感缺少人手。1832年12月，裨治文就曾致函美部會，提出增派一名熟練印刷工的請求。1833年

2月，他再次致信美部會諮詢委員會秘書魯弗斯·安德森，稱自己已不堪重負，迫切需要一名“忠誠、虔誠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刷工”^④。1833年10月，衛三畏抵達廣州，不久即開始全面負責印刷所的日常事務。當時印刷所僱用了一些當地人印製中文《聖經》及佈道手冊，梁發就曾在印刷所從事木刻版印工作。然而印刷所更多的印刷工是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因此衛三畏發現為了指揮這些印刷工，他首先要學習的是葡文而不是中文。^⑤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為當時清政府嚴禁出版和散發宗教書刊，華人印刷工一旦被官府發現，就會被逮捕判刑。梁發的三名印刷工曾遭官府拘捕關押，梁發本人亦因刊印和散發宗教書刊被官府追捕，幸賴裨治文的幫助，他得以從澳門逃往新加坡。^⑥這應是美部會決定在1835年12月將印刷所遷往澳門的根本原因。

遷往澳門後，布魯恩印刷所在業務上面臨三家競爭對手：一家葡萄牙人開辦的、一家中國人開辦的，還有一家日本人開辦的。^⑦到1839年時，據衛三畏寫於澳門的一封信可知，布魯恩印刷所有三位工人：“一位葡語排字工，他對英語一無所知，也幾乎不認識一個漢字，但卻為有這兩種文字的書排字，我和他用葡語能夠勉強交流；另一位中國小伙子既不懂葡語也不懂英語，他負責排漢字，活幹得很好；最後一位是日本人，他不懂英文、葡文、中文（幾乎不懂），所以從架子上取鉛字時常犯錯誤。當他們三個人幹活時，我必須用他們各自的語言與他們交流，並且指導他們去印一本本他們絲毫不知道其內容的書。”^⑧不久之後，又有兩名華人加入，印刷工人增至5人。布魯恩印刷所在澳門期間，印刷工人就保持在5名左右。遷往香港後的情況，因時間不長資料缺乏而無法確知，但大概不會與在澳門時有多大差別。1845年遷回廣州，甚至到1856年時，布魯恩印刷所規模仍然不大。據衛三畏說：“我的印刷所規模很小，而且還在使用木版印刷大部分中文小冊子。”^⑨可見，維持3~5名印刷工成為印刷所的常態。之所以如此，除安全因素外，更大的可能是因為經費問題。美部會對出版，甚至包括學校、醫院等在傳教上的作用不甚滿意，投入的經費十分有限，伯駕（Peter Parker）在廣州的醫院主要靠從外國人募捐的資金來維持，布魯恩印刷所同樣如此。據衛三畏說，印刷所“沒有任何外來的資金援助。我們的印刷所完全是靠我們自己出版的書刊來自給自足，其中就包括《叢報》（引者按：即《中國叢報》）。如果僅從經濟利益上來考慮，《叢報》並不成功。”^⑩為節省開支，印刷所自然不便僱用更多人手。

四、布魯恩印刷所的出版品及其影響

布魯恩印刷所從1832年5月成立，到1856年12月被燒毀，輾轉廣州→澳門→香港→廣州四地。除多次承印的各種小冊子，如醫學方面即有《醫學傳教會報告》（*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1841-1842年澳門醫院報告》（*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國醫學傳教會第一和第二個報告》（*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等不計算在內，其在存續的25年間，出版的書刊（含重印數）就達38,000冊。^⑪其出版品中，卷帙最為浩繁者非《中國叢報》莫屬。該刊從1832年5月創刊，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出版20卷，包括1~5卷的重印冊數，總印數達23,000冊之多。至於刊物的宗旨，首任主編裨治文在創刊詞中宣稱：

要對外國人出版的有關中國書籍進行評論，旨在注意已經發生的變化……關於博物方面，最適宜和有利的是調查下列情報：氣象，包括氣溫、風、雨及氣象對健康的影響；

土地，包括礦藏、植物、畜產、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狀況，還包括江、河、海中的出產；……關於商業方面，必須特別引起關注的是要調查其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情況，特別要考察當前商業狀況的利弊；……關於社會關係方面，必須對社會結構詳細調查，在考察中國人的道德品質時，要對他們政治事件的相互關係，包括統治者與百姓、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仔細和長時間不間斷地觀察；……我們對中國人的宗教特徵也感興趣，將給予非常強烈的關注。^④

可見，裨治文創辦該刊的目標就是收集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報史專家白瑞華（Roswell S. Britton）在談到《中國叢報》時也指出，其宗旨就是向西方“提供有關中國及其鄰近地區的最可靠的和最有價值的資料”^⑤。然而就其終極目標而言，還是希望它有利於傳播福音。這從裨治文日記可窺其一斑：“願它無論在開端，還是在這之後，都全然成為主的事業；願它所有的篇章都能夠增加神的榮耀和真理。”^⑥據統計，《中國叢報》共刊文 1,378 篇，其中關於中國國情的達 514 篇，關於中外關係的 396 篇，外國類的 142 篇，宗教類的 289 篇，與中國有關者約佔 90%^⑦，內容廣泛涉及中國歷史、宗教、法律、政治、語言、農業、儒家經典、文學作品等方面，尤其特別注意報導中國時事與對外關係，並記載了鴉片戰爭的全過程。由於其銷售幾乎遍及全球，該刊就成為西方人瞭解中國各個領域的一個最可靠的、最基本的知識來源。譚維理甚至稱該刊“是當時唯一的漢學雜誌”^⑧。的確，由於撰稿者都是當時在華的英美漢學家，說它是一份漢學雜誌可謂實至名歸，它對西方漢學的發展影響是深遠的。

《中國叢報》確以其豐富的史料為當時乃至後來治學者所重視。衛三畏即稱“有關當時中國與東亞方面之事實與意見的記述，這是一部有用的文學作品”^⑨，“其中包含著當時中外關係的歷史”^⑩。美國宗教史家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認為《中國叢報》“是有關中國知識的礦藏”，“這是當時中國對外關係最好的史料”，是研究當時的中國“不可缺少的史料”^⑪。羅家倫也說：“研究鴉片戰爭的人，不能不參考當時廣州英國人出版的定期刊物……名叫 *Chinese Repository*，這是一種重要的史料。”^⑫儘管羅先生誤將《中國叢報》說成是英國人所辦，他對《中國叢報》的學術價值卻是充分肯定的。王樹槐也指出：“《中華叢刊》^⑬在今日的價值，則為其豐富的史料。”^⑭誠為的論。總之，《中國叢報》是當時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外文期刊之一，在中國報刊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時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除《中國叢報》外，布魯恩印刷所出版最多的是供西人學習漢語用的字典、詞典和教材。據不完全統計，即有麥都思的《福建土話字典》（1835-1837）、裨治文的《廣州方言中文文選》（1841）、衛三畏《拾級大成》（1842）、《英漢對照詞彙表》（*Ying Hwa Yun-fu Lih-Kiai,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1844）；法國漢學家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的《中國語文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英譯本（1847）、博尼的《廣東話詞彙和口語習慣用法》（1854）、衛三畏的《英華分韻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56）等。進入十九世紀後，新教各差會紛紛派遣傳教士來華。為了開拓傳教事業，與中國民眾直接交流，傳教士必須首先掌握漢語，當然也包括他們所在傳教地區的中國方言。從馬禮遜開始，這些新教傳教士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還編寫了大量的字典、詞典以及教材，目的是給後來傳教士及來華西人學習漢語提供幫助。布魯恩印刷所大量出版此類出版品，也是出於同樣考慮。下面重點介紹《福建土話字典》、《廣州方言中文文選》、《拾級大成》及其影響。

《福建土話字典》是印刷所在澳門期間出版的第一部字典，這是繼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之後傳教士編纂的第二部方言字典，也是目前所見的第一部福建方言尤其是閩南語字典。共分為七個部分，分別是致讀者（Advertisement）、前言（Preface）、福建簡史與統計資料（A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of Hok-keen）、福建方言正字法（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正文、筆劃索引（Table of the radicals）和漢字索引（Index of characters which occur in this dictionary）。正文中每個詞條包含了該字的閩南話讀音和英文解釋，還給每個主要漢字組詞引用名著或典故中的一句話來解釋它的用法，並將該片語或句子翻譯成英文。麥都思 1823 年即完成該字典初稿，到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等地尋求出版未果後，1829 年東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資助出版，此後麥都思對其又作了大量增補。1831 年開始，該字典交由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出版，但僅印刷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的取消而中止。由於出版資金不足，1835 年 12 月，麥都思來到廣州、澳門尋求資助，美國商人奧立芬慨允資助，該字典遂交由已遷往澳門的布魯恩印刷所出版其餘部分。直到 1837 年 6 月，《福建土話字典》的印刷工作終於全部完成。

布魯恩印刷所出版的第二部此類作品就是裨治文編纂的《廣州方言中文文選》⁹，1841 年在澳門出版。全書共分 17 篇：（1）習唐話；（2）身體；（3）親誼；（4）人品；（5）日用；（6）貿易；（7）工藝；（8）工匠務；（9）耕農；（10）六藝；（11）數學；（12）地理志；（13）石論；（14）草木；（15）生物；（16）醫學；（17）王制。這部辭典是美國人撰寫的第一部漢語學習的工具書。裨治文發現，隨著來華西人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學習漢語，而在廣東的西人首先要學會的自然是廣東方言——粵語。但“西方人與廣東人交往的兩百多年，一直忽視了粵語這種方言，這種情況不應再繼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編寫了這部《廣州方言中文文選》，希望它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並對那些有志於此的人提供一些幫助。”¹⁰實際上在此之前，馬禮遜在 1828 年已經出版了一部有關廣州方言的字典，即前揭之《廣東省土話字彙》。《廣東省土話字彙》雖試圖用於粵語發音參考，但誠如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所指出的，其“內容過於簡單，沒有標注粵語的語法和用法介紹”¹¹。裨治文編纂一部新的粵語辭典，就是要彌補《廣東省土話字彙》之不足，使它不僅可以“幫助外國人學習中文”，而且能夠“幫助中國年輕人掌握英語，使中國人認識到羅馬字母所組成的英語是多麼易於表達和簡單易學”¹²。基於此目標，該書在排版上進行創新，大部分文本採用三欄式排版，將同一內容分別用英語、中文和羅馬拼音的粵語三種形式表達出來。衛斐列認為：“該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在中國寫作完成的第一本有關廣州方言的實用手冊，在長期沒有同類教科書出現的情況下，它一直是學中文的好幫手。”¹³該書的出版給裨治文帶來極高榮譽。為了表彰裨治文的這一大貢獻，紐約大學在同年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鮮為人知的是，衛三畏在這部辭典上也花費了大量心血。他在接印這部辭典後，曾花費全力對其進行擴充，其擴充的內容“包括蒐集成語加以翻譯和選擇現成的中文作品片段”，但衛三畏最後並沒有署名。

但是，大八開本、693 頁的部頭，使這本工具書使用起來不太方便，而且價格偏貴，這就促使衛三畏決心編纂一部關於廣州方言的教材，而擴充《廣州方言中文文選》的經歷為他奠定了基礎。經過一番辛勞，到 1841 年春，一部八開本、287 頁的《拾級大成》編成，1842 年由布魯恩印刷所出版。《拾級大成》共包括 10 章，即部首（of the radicals）、字根（primitive）、讀和寫（of reading and writing）、閱讀課程（lessons in reading）、對話練習（exercises in conversation）、閱

讀節選 (selections for reading)、量詞 (the classifiers)、翻譯練習 (exercises in translating)、英譯漢練習 (exercises in translating into Chinese)、閱讀和翻譯課程 (lessons in reading and translating)。該書除了通過一系列練習和對照互譯來幫助外國人學習廣州方言外，還力圖起到漢語通用語法書的作用。衛三畏運用西方語言學習的方法來教習漢語。他首先介紹了漢字的部首和字根，以《康熙字典》的214部首法講解部首和字根的含義，以便讓學生理解漢字的構成法。會話、練習題則主要針對廣州方言學習，其中包含便於西方人與不懂英語的漢語老師和中國僕人交流的基本日常用語。有趣的是，這些日常用語保留了當時在華西方人與中國人交往的生活細節，是現代學者進行社會生活史考察的基本史料。《拾級大成》保存下來的大量廣州方言語音資料，即使只從語言學研究角度看，其學術價值也彌足珍貴。

新教傳教士編纂的字典和教材的突出特點，就是在方便西人學習漢語的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瞭解。麥都思的《福建土話字典》共收12,000個漢字，涉及的詞彙有22類，每個詞條不僅包含了該字的閩南話讀音和英文解釋，而且還給每個主要漢字組詞引用《四書》、《五經》、《詩經》、《論語》等名著中的一句話來解釋它的用法，並將該片語或句子翻譯成英文。這部字典後來成為西方人學習閩南語的重要工具書，同時也成為他們瞭解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料。正如雷孜智所評價的：“儘管該書表面上向語言學習者提供一系列關於基本語法和詞彙學習的簡單課程，但實質上，它還承擔著向西方人介紹中國與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歷史成就的基本知識的雙重使命。”^④《文選》中還包括了海外的地理和歷史知識，像“法蘭西王者號路易·菲利，建都城曰巴黎”、“推布地球，以亞細亞、歐羅巴、亞非利加為正面，美理哥為背面”等淺顯易懂的介紹在書中也甚為常見。衛三畏的《拾級大成》同樣如此。其中的漢譯英、英譯漢練習，所選材料大部分來自《四書》、《三字經》、康熙的《聖諭廣訓》以及中國古典文學《三國演義》、《聊齋》、《女學》、《玉嬌梨》等，這些選材不僅文字優美，而且也極能反映中國文化的特殊之處，如《聊齋》是反映中國人對鬼神一事的看法，並且許多故事也能體現“善惡終有報”這一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女學》則更具代表性，它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對婦女的束縛。這些顯然有助於西方人瞭解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傳統。閱讀與翻譯部分的内容，則選自中國人的日常文書，包括按照中文格式書寫的家信、請柬、對外佈告、奏表、聖旨，最後一篇是林則徐致英國女王的信，後面都有詳細的英譯對照。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漢語學習者獲得有關中國的各類信息，從而將語言的學習和知識的學習結合起來。美國華裔學者鄧嗣禹在評價馬禮遜《華英字典》的影響時說：“馬禮遜辭典的出版使西方社會掌握了理解中國文化的鑰匙，並且比以往更深刻具體地認識了中國的制度。”^⑤布魯恩印刷所出版的上述字典、辭典和教材，亦可作如是觀。

綜上所述，似可這樣說，布魯恩印刷所及其出版品，不僅在中國印刷出版史，而且在中外關係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與西方漢學史上，均極具意義與貢獻。

① 萬啟盈：《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頁。

② 楊萬秀主編：《廣州通史》（近代卷·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91頁。

③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蕭濬華

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61～262頁。

④ 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增補本），耿昇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頁。

⑤ William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London: Simpkin and Marshall,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42, p. 31.

⑥未亡人編：《馬禮遜回憶錄——他的生平與事工》，鄧肇明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83頁。

⑦米憐：《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2頁。

⑧湯森：《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11頁。

⑨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48頁。

⑩顧長聲：《馬禮遜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23頁。

⑪朱佑人：《基督教在華一八〇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基督教會教牧同工會、馬禮遜堂等，1987年，第16頁。

⑫艾莉莎·馬禮遜編：《馬禮遜回憶錄》（1），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67頁。

⑬⑭⑮⑯⑰⑱ J. F. Coakley, *Printing Office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7-1900*, *Harvard Library Bulletin*, Vol. 9, No. 1 (1998).

⑲⑳ Eil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Vol. 2, pp. 406, 435.

㉑⑳㉒㉓㉔㉕ 雷孜智 (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3、80、84～85、134、135頁。

㉖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6頁。

㉗㉘ Eliza J. Gille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A. D. F. Randolph, 1864, pp. 37, 74.

㉙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77.

㉚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顧鈞、江莉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頁；J. M. Braga,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at Macao*, Lisboa, 1963, p. 100；J. F. Coakley, *Printing Office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7-1900*. 關於布魯恩印刷所遷往澳門的時間，也有學者認為是在1836年，見趙春晨、郭華清、伍玉西：《宗教與近代廣東社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316頁。

㉛1841年裨治文的《廣州方言中文文選》(*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由衛三畏完成印刷，出版信息標注為“澳門：衛三畏”(Macao: S. Wells Williams)。

㉜⑳㉝⑳㉞⑳㉟⑳㊱⑳㊲⑳㊳⑳㊴⑳㊵⑳㊶⑳㊷⑳㊸⑳㊹⑳㊺⑳㊻⑳㊼⑳㊽⑳㊾⑳㊿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第36、105、153～154、156、56、56、154、24、56、151、103、155、53頁。

㉞ Richard M.A.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 Vol. 1, pp. 453-454. 中譯文轉引自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68頁。

㉟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559. 施白蒂則認為《中國叢報》是在1844年12月起轉去香港印刷的，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10頁。

㊱裨治文致安德森，香港，1845年5月26日，轉引自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第208頁。

㊲ Samuel Wells Williams, *Movable Type for Print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pp. 22-30.

㊳劉聖宜：《近代廣州社會與文化》，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6頁。

㊴⑳㊵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第80、107頁。

㊶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第154～155頁。科克利(J. F. Coakley)認為璞鼎查贈與布魯恩印刷所活字是在1844年，顯誤。見J. F. Coakley, *Printing Office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7-1900*.

- ④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 pp. 1-5. 中譯文引自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9頁。
- ④9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3, p. 28.
- ⑤⑤8 王樹槐：《衛三畏與〈中華叢刊〉》，載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
- ⑤② 譚維理：《一八三〇至一九二〇年美國人之漢學研究》，台灣新竹：《清華學報》，新第二卷第二期。
- ⑤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1, "Editorial Notice".
- ⑤④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882, Vol. 2, p. 333.
- ⑤⑤ 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29, p. 265;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p. 40, Note 4, p. 180.
- ⑤⑥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武漢：《武漢大學科學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31年）。
- ⑤⑦ *The Chinese Repository* 本無中文刊名，中文譯寫為

《中國文庫》、《澳門月報》、《中華叢刊》、《中國叢報》等，目前學界通行譯名為《中國叢報》。

⑤⑨ 該書原無中文名，故出現多種譯名：日本學者曾譯為《廣東語模範文章注釋》、《廣東語句選》等；中國學者則有《廣東方言讀本》、《廣東方言撮要》、《廣東方言唐話讀本》、《廣東方言中文文選》等譯名。

⑥⑥⑥ 裨治文：《廣州方言中文文選》（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導言，第1頁，轉引自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第135頁。

⑥⑥ 鄧嗣禹：《中國科舉制在西方的影響》，載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四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作者簡介：譚樹林，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 210023

[責任編輯 陳志雄]